

# 那时我们还年轻

## ——在启东参加肝癌研究的往事

When We Were Young——A Bit of the Past in Liver Cancer Research in Qidong  
YANG Bing-hui

杨秉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 200032)

**摘要:**作者曾经作为上海市赴启东医疗队的一员,参加了启东早期肝癌防治研究工作。从自己和启东一批年轻好学的防治人员共同抗击肝癌的经历,见证了启东肝癌防治现场病因、诊断和治疗的开创性工作和发展。

**关键词:**肝癌;现场防治;体会;启东

**中图分类号:**R7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242(2012)10-0744-03

50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医学生的时候,内科学书本关于肝癌的介绍就是“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43年前的1969年,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我们能得到的惟一与业务相关的信息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攻克癌症。于是中山医院成立了“肿瘤小组”,明确今后的专攻方向为肝癌后来改名为“肝癌小组”。由于在“文革”前我曾跟随当时中山医院院长林兆耆教授做过肝癌的医疗工作,于是被编入小组成为其中的成员之一。

在“肝癌小组”经管的病房中,经常有来自江苏启东的肝癌患者,这让我们将“肝癌”与“启东”联系起来。年轻人好奇,总想一探究竟,终于在那年夏秋之交,我与同事蔡迺绳医生带着中山医院“革委会”的介绍信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乘了一夜的小火轮,来

到江苏启东这个陌生地方。记得当时的汇龙镇就只有一条不宽的街道,街道两边有几间平房店铺,几乎没有机动车辆,用于载客的不是黄包车、也不是三轮车,而是一种用后座载人的叫做“二等车”的脚踏车。与上海的“革命”气氛相比,启东明显显得冷落。



左起: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陈建国研究员、和合医院的“肿瘤医生”黄谨遒、本文作者杨秉辉教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于志坚教授

杨秉辉教授在当年启东同事的陪同下访问曾经工作过的和合卫生院(现启东市第四人民医院)

收稿日期:2011-06-25  
E-mail:yang.binghui@zs-hospital.sh.cn

启东卫生局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稍见瘦小的中年男性,后来知道他是当地卫生系统人称“小老沈”的人。“小老沈”问:“你们要来搞钩端螺旋体病?”当得知我们是来了解当地是否肝癌高发时,“小老沈”并不肯定地回答说:“好像是多”。在查阅了转外地医疗的登记簿后,明确了转上海医疗的确实大多是肝癌。这次的调查是我们认识启东肝癌之始,至少也证明启东肝癌确实很多,但这个“多”字,对启东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来说却没有具体数据说明。

1971年,为使“攻克癌症”的号召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以中山医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细胞所的医疗、科研人员组成的“上海医疗队”到启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后来,江苏省也同样派出了医疗队来到启东与我们“并肩作战”。医疗队的队部设在汇龙镇,医疗队员要经常到队部来开会、汇报、交流、学习。为了支持、配合医疗队的工作,启东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也组织了相当的医疗、研究力量,与上海、江苏两支医疗队通力合作。

几乎就在那年,前苏联科学家阿贝律夫发现肝癌患者血中存在甲胎蛋白,经过试用后我们也证实甲胎蛋白确实能用于肝癌诊断,于是想到可否将甲胎蛋白用于启东的肝癌“普查”。这个想法得到了启东当地卫生部门的支持,于是肝癌普查成了医疗队的主要任务。除了肝癌普查工作,医疗队员也会看一些普通门诊,有空还会给当地的医务人员做些“抗生素的临床应用”之类的讲座,颇受欢迎。当地民众有病都喜欢找“上海医生”“识一识”,时间久了,我们也会用一些当地的方言问病史,如:头升昏吧(头昏吗)?脚骨郎酥吧(两脚发软吗)?真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

我于1972年2月参加上海医疗队到启东“深入基层”,吃、住都在和合公社卫生院中,当时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最初的房间是以篱笆做间隔的,房子好像是芦苇泥巴墙的瓦房,具体有些记不清楚了。除了化验室是独立间,工作区、生活区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分隔。那时没有计算机,所有工作都是手工进行,肝癌普查的数万份资料都记录在一张张卡片上,分析统计时就抄录在一张张张大纸上,挨个儿点数统计。伙食也甚简单,一种叫做“盐荠汤”的咸菜汤是经常有的。卫生局的负责人“大老沈”——沈万高同志对肝

癌研究是着力支持的,只要是在能力范围内他总是有求必应,甚至被大家称为“肿瘤局长”。“肿瘤局长”对来研究肝癌的医疗队还是十分照顾的,经常设法改善伙食,每到有医疗队员返沪,他也总会弄些海蜇皮等当时十分稀缺的海产品让大家带上。

当时的现场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团结协作,上海的、江苏的医疗队员,启东当地的医疗、科研人员,做流行病学调查的、做肝癌普查的、做肝癌手术的、用中药治疗的,大家亲密无间地在肝癌研究领域里做着“拓荒”性工作。之所以称为“拓荒”性的工作,是因为那时学术界、甚至国际学术领域中对肝癌的流行情况、病因、早期诊断、治疗等都知之甚少。据我个人所知,那个时期启东的肝癌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属于开创性的。

①流行病学研究证明:启东及其附近的长江入海口地区为我国肝癌高发地区,而在“高发区”内尚有相对的低发点,肝癌的这种地理分布特点,为病因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②关于乙型肝炎、黄曲霉毒素与肝癌关系的研究加深了对肝癌病因的认知,而关于饮水污染与肝癌关系的研究更属首创,极大地丰富了肝癌病因学研究的内容。在著名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教授领衔发表、以启东流行病学资料写成的关于饮水污染与肝癌发病关系研究的论文后,国际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对此进行了评论,我国肝癌预防七字方针“防霉、改水、防肝炎”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在我国肝癌的预防、甚至农村饮水卫生的改进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③虽然在上海的杨浦、闵行等地的工厂中已开始通过检测甲胎蛋白普查肝癌,但大规模的高发区人群筛查则始自启东。启东的肝癌普查工作证明了甲胎蛋白在肝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并首创了微量血的采血和检测方法,提高了受检人群的依从性。1972年,我将启东与上海两地的肝癌普查资料汇总、用“中国肝癌研究组”的署名写成“Application of serum Alpha Feto-Protein assay in mass survey of primary carcinoma of liver”一文,第二年由上海肿瘤医院俞鲁谊教授在意大利波伦亚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癌症预防和早期诊断大会上报告,为我国肝癌早期诊断研究在国际上最早的报告,也是国际上最早的关于肝癌筛查工作报告。

④我国肝癌外科手术切除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由于早期诊断困难,能手术治疗的病例有限,启东的大规模肝癌普查发现了许多早期肝癌病例,积累了许多肝癌手术切除的经验。“普查—早期发现—手术切除”的模式明显地改善了肝癌的预后,也为日后我国关于“小肝癌”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然,这些仅仅是启东肝癌研究开创时期的部分工作,还有其他许多工作都是值得铭记的。

医疗队在启东的工作是临时的,启东当地同志们的坚持才是最可贵的。启东从事肝癌研究、治疗的同志们组成了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继续在这块被肝癌肆虐的土地上,为了家乡父老、也为了中国与世界的抗癌事业,与“癌中之王”奋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记得那年(1972年)我 34 岁,上海、江苏医疗队里年龄稍长的汤钊猷医师等也不过 40 多岁,启东的同行们则更年轻,从事流行病学调查的李文广医师大约与我同岁,外科的黄兴耀医师、内科的张宝初医师、王墨荣医师当时都不到 30 岁,于志坚医师则刚

刚大学毕业。朱源荣、陈建国医师就更年轻了。真的,“那时我们还年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能够以十分简陋的条件开拓了启东的肝癌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值得记述的。

我本人只参加了启东肝癌研究初创时期一年多的工作,却获益匪浅。启东的同志们则坚持至今。许多同志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辛勤的劳动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据我所知,依托肝癌高发区的研究优势,启东的同志们在肝癌与肝炎关系、乙肝疫苗预防肝癌、肝癌遗传因素、砸在肝癌发病中的干预性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创建至今已经 40 年了,40 年来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肝癌研究领域向启东人民、抗癌事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报告。如今我们已不再年轻,但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启东的肝癌防治研究必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期待着……

## 作者简介

**杨秉辉** 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 年毕业于前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任职于附属中山医院,从事内科诊疗及肝癌临床研究工作。曾因“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85 年,第 3 完成人)、“肝癌二级预防的评价”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1 年,第 1 完成人)等多项奖励。著有《肝胆肿瘤学》、《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与进展》、《现代内科学进展》、《全科医学概论》等专著十余部,在国内外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140 余篇。

曾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1972~1974 年曾参加上海赴启东医疗队,在启东参加肝癌防治工作。